

中国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中的隐喻话语： 生成逻辑、功能定位及规范应用

王立峰 夏清明

摘要：纪检监察隐喻话语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精髓、服务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语言符号，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实践属性和文化标识。它通过“制度笼子”“政治生态”“政治体检”等具象化意象，将党的纪律、权力监督等抽象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认知框架，实现核心概念的具象阐释、腐败危害的本质揭示、治理策略的公众认同，同时承载“治病救人”“刮骨疗毒”等价值理念。在纪检监察话语体系构建中，隐喻话语通过赋能理论阐释、打造本土话语符号、提升教学实效、拓展学术议题，推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但也面临概念泛化、国际传播偏差、与法言法语协调不足等挑战。未来需夯实隐喻话语的理论基础与文化底蕴，提升隐喻话语使用精准度与适配性以及增强隐喻话语认同与影响力，最终服务于中国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中国特色；隐喻话语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6)01-0005-10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1]在“十四五”时期中国反腐败事业取得重大成就、作为新设一级学科的纪检监察学方兴未艾的时代背景下，构建具有中国风格、时代特质与学术品格的话语体系，不仅是加快构建中国纪检监察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之义，也是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的内在要求。其中，隐喻话语这一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融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精髓、服务于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独特语言现象，正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纪检监察话语体系中

最具穿透力与辨识度的符号形态。“隐喻作为一种隐含着比喻的修辞格，从词源上来说它是一种意义借用，将原本属于某些语词的本义借用来表达相关意义，隐喻意义与本义是一种对应关系，正是这种对应关系，人们才能通过改变后的语词的惯常用法实现对特定事物的领悟和理解。”^[2]纪检监察隐喻话语借助具体可感的意象，如“毒瘤”“笼子”“蛀虫”“显微镜”“探照灯”等隐喻来塑造抽象的政治现实，将复杂的政治理念、治理逻辑和意识形态要求，转化为符合大众认知习惯、易于理解传播且能激发情感共鸣的话语符号。学界关于隐喻的研究，从乔治·莱考夫与马克·约翰逊提出“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3]以来，已

收稿日期：2025-09-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研究”(23ZDA131)；南开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项目“纪检监察法规制度体系研究”。

作者简介：王立峰，男，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长春 130012)。夏清明，男，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 130012)。

超越修辞学范畴,成为理解人类概念系统与意识形态构建的钥匙。国外研究涉及竞选语言^[4]、危机叙事^[5]等方面;国内研究聚焦于新闻报道^[6]、外交辞令^[7]、特定政策^[8]等话语分析。对纪检监察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领域,学界的系统性探讨还相对欠缺,已有研究或从整体上探讨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的基本类型^[9]、话语体系构建的历史演进与原创贡献^[10]、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维度^[11]以及具体的构建路径^[12]等,或讨论个别典型隐喻,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3]“政治体检”^[14]“制度笼子”^[15]等。总体来看,现有研究还缺乏从学科话语体系构建的视角深入剖析纪检监察隐喻话语的生成逻辑、功能定位及其如何支撑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构建。

中国纪检监察话语的生成土壤与实践向度,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实践、中华传统治理智慧、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度交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16]¹⁸，“打铁必须自身硬”^[17]，以及将反腐败工作喻为“永远吹冲锋号”^[18]等精辟论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话语层面的契合。纪检监察隐喻话语的勃兴源于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实践的现实需求。纪检监察工作承载着将抽象纪律、权力监督机制、治理理念转化为可理解、可传播、可执行的话语任务,隐喻话语的具象化优势恰在于此。它弥合抽象规范与感性经验的鸿沟,如将腐败喻为“毒瘤”“污染”,形象揭露其危害性,激活人民的感性认识与道德抵触。这套语言系统对于塑造集体认知心理、激发人民对腐败的警惕与痛恨,动员全社会支持反腐败事业发挥重要功能。本文将对纪检监察隐喻话语进行初步探讨,通过系统分析探索构建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的方法与路径。

一、纪检监察隐喻话语的生成逻辑与基本特征

要深刻理解纪检监察话语体系中隐喻话语所承载的独特的价值导向,首先需要系统探究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话语究竟从何而来,又何以形成独特风格。这是理解隐喻话语在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构建中究竟发挥着何种作用的前提与基础。

(一) 纪检监察隐喻话语的生成逻辑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中的话语

传统。纪检监察隐喻话语的理论根基深植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19]在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思想逐步形成,为纪检监察话语提供了话语资源和理论指引。例如,列宁指出:“必须把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分子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头换面’但内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20]列宁关于“清党”的论述被创造性转化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16]⁹²的形象表述,强调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成为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原则和价值取向,直接催生了“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21]、“红脸出汗”、“咬耳扯袖”等一系列隐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关于制度建设、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思想,则体现在制度“笼子”“防火墙”等隐喻的广泛应用上,突出了制度在防治腐败中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作用^[22]。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深刻阐释的“勇于自我革命”“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净化政治生态”等重大理论观点,本身就是极具认知建构与价值传导的核心隐喻概念。这些源自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概念和命题,为纪检监察话语体系构建提供了语义框架和基本价值导向,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语境下的生动体现,是党对权力运行规律、反腐败斗争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语言结晶,构成了纪检监察隐喻话语生成的灵魂与理论源泉。

第二,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腐倡廉实践的话语积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史,也是一部激浊扬清的自我革命史”^[23],贯穿其中的反腐败斗争不仅积累了丰富经验,也孕育出具有鲜明实践指向的纪检监察话语,尤其是其中的隐喻表达。这些话语源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应对腐败的具体实践,是对反腐败斗争性质、策略与目标的形象化凝结。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对“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24]的宣示,实践中形成的“毒瘤”等隐喻,揭示了腐败对革命事业的致命侵蚀性。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常洗脸”“打扫灰尘”^[25]以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26]等体现了通过思想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帮

助同志改正错误的初衷。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新的考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27]的思想以及“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28]379}的论断则催生了“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28]314}等话语,反映出党对腐败复杂性的深刻认识及相应治理策略。进入新时代,“打虎”“拍蝇”“猎狐”“微腐败”“蝇贪蚁腐”等一系列隐喻话语被广泛使用,形象描绘出不同层级腐败的分布特征与治理重点,彰显了党“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29]的坚决态度。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展的整党整风运动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 and 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从惩治个案腐败到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反腐败斗争不断走向制度化、常态化。在此过程中,“政治体检”“拧紧螺丝”“毒瘤”“攻坚战”等大量生动隐喻纷至沓来,它们不仅记录并诠释了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反腐败形势的判断与策略选择,凝聚着丰富的治理智慧,也沉淀为纪检监察话语体系中最具生命力和传播力的语言载体,持续滋养着新时代的纪检监察话语实践。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监察思想与修辞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的监察思想、吏治智慧和政治修辞智慧为新时代纪检监察话语体系构建提供了独特的文化基因和认知源泉。如儒家倡导的“为政以德”“德主刑辅”“修齐治平”的思想,法家提出的“明法度”“行赏罚”的主张,墨家提出的“兼爱”“非攻”的平等诉求,道家奉行的“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治理境界以及各朝代明君贤臣关于整治贪腐的实践探索,共同构成了一个关于权力监督、官员治理的庞大思想宝库。这些传统智慧被创造性地转化为纪检监察话语的形象载体。例如,儒家倡导的德主刑辅思想催生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工作方针,将腐败分子视为“病人”,体现了党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的理念。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还蕴藏着丰富的隐喻修辞,古人常运用类比、象征等修辞手法来阐释政治理念,诸如“沉疴”“刮骨”等隐喻修辞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提供了话语素材。纪检监察话语吸收并激活这些文化符号,构建出“政治生态”“制度笼子”“探照灯”等现代隐喻。这既增强了话语的文化底蕴与民族特质,也使反腐理念更易于传播和获得认同,让古老智慧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纪检监察话语体系的独特标识。

第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经验总结。

纪检监察隐喻话语的系统性建构与蓬勃发展,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在话语层面的深刻凝结与升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空前力度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仅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还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源自实践探索的深刻认识和战略部署,迫切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话语进行精准阐释并有效传播。纪检监察隐喻话语正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管党治党实践经验基础上,主动创造并不断丰富语言载体,是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认知和话语标识的生动体现。例如,对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科学判断,催生了“攻坚战”“持久战”“永远在路上”等隐喻,这些话语是对反腐败斗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深刻总结,形象传递了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的实践要求。因此,新时代纪检监察隐喻话语的每一个鲜活表达,无不深深植根于全面从严治党的生动实践,是对实践探索进行系统归纳和创造性转化的语言成果,是讲好中国反腐故事的宝贵话语财富。

(二) 纪检监察隐喻话语的基本特征

1. 鲜明的政治导向

纪检监察隐喻话语的根本特征在于其鲜明的政治导向,这是其区别于其他话语体系的本质标识。它通过精心选用的隐喻话语及其具象化表达,将党的意志、立场、宗旨转化为生动意象。如“探照灯”“显微镜”“政治体检”等隐喻,旨在锚定纪检监察工作作为党内监督专责机关的政治定位,形象传达监督的穿透力、系统性与预防性,目标直指维护党的肌体健康;如“打铁还须自身硬”“刀刃向内”等表述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决心”^[30],凸显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忠诚卫士”的角色。这些隐喻话语的生成逻辑与最终归宿,皆在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先进纯洁,保障党的决策部署贯彻执行。从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构建的维度来看,这种具有鲜明政治导向的隐喻话语正是纪检监察学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兴特色学科存在和发展的根基所在。换言之,这些中国特色纪检监察隐喻话语通过反复强调纪检监察工作的政治本质、使命目标以及工作任务,不仅为纪检监察学科确立了价值基石,也为纪检监察学的核心概念提供了独特的阐释路径,成为构建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时能够统摄全局、贯穿始终的灵魂主线。

2. 强烈的实践指向和行动号召力

中国特色纪检监察隐喻话语的显著优势在于其

强烈的实践指向和行动号召力,使其不仅是理论概念,更是直击现实、指导实践的“动员令”。这种特质源于隐喻话语对纪检监察工作复杂实践的高度抽象与具象还原。例如“打虎”、“拍蝇”、“猎狐”、“攻坚战”、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刮骨疗毒”等纪检监察隐喻话语,将反腐败斗争这一艰巨任务通过熟悉的“战争”“治病”等现实场景生动地演绎出来。这些隐喻在党内能够统一思想、激发纪检监察干部的使命担当;在党外则可凝聚社会共识,动员群众支持参与,使纪检监察政策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知、可参与的全民行动。从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构建的角度来看,这些具有突出实践导向的纪检监察隐喻话语在构建学科话语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有利于确保纪检监察理论研究具有针对性,使之能够紧密围绕反腐败斗争中最迫切的问题展开。另外,需要突出强调的是,纪检监察隐喻话语还塑造了纪检监察学科的实践品格以及解决实践问题的导向,从而使中国纪检监察学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能够天然地根植于中国反腐败斗争的伟大实践,成为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实践解释力的应用型社会科学分支,为纪检监察学的后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标识

纪检监察隐喻话语的独特魅力,在于它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反腐败话语体系。这使其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鲜明的民族标识,更实现了价值观念与文化基因在新时代纪检监察话语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其文化底蕴和民族标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思想源流上,自觉传承了源远流长的监察思想与政治智慧。例如,“治病救人”理念承继了传统“医者仁心”与“仁政”思想中对挽救干部的重视;“刮骨疗毒”的决绝,融汇了古代英雄的刚毅品格与革命精神,彰显反腐败的彻底性;而“以戒为固,以怠为败”^[31]、“公生明,廉生威”^[32]等古训中的自律、公正价值,则内化于“制度笼子”“堤坝”“高压线”等隐喻,强调党纪国法的刚性约束。二是通过对文学修辞资源的激活,将古代诗词典故中常见的医喻、水喻、镜喻等,转化为构建纪检监察话语的灵感来源。这种深层的文化连接,使“治吏”“德主刑辅”等传统智慧在新时代反腐败语境中获得全新内涵与表达。这种文化底蕴铸就了纪检监察隐喻话语鲜明的民族标识。诸如“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传递的不仅是一种治理策略,更是一种文化自信;“蛀

虫”“害群之马”也不仅指代腐败对象,更在民众心理层面激发出对腐败的憎恶。这种从民族文化深层生长出来的隐喻,赋予了中国纪检监察工作鲜明的“中国印记”。对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构建而言,深入发掘并系统阐释隐喻话语中的文化底蕴,是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必要环节。

二、隐喻话语在纪检监察话语体系构建中的功能定位

在厘清纪检监察隐喻话语的生成逻辑并把握其鲜明的政治性、实践性和民族性等特征之后,随之而来的另一核心议题是这一套独具特色的话语在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构建中,究竟发挥着何种作用?

(一)核心认知构建与理论阐释功能

第一,复杂概念的具体化与形象化。纪检监察工作的一些抽象性理论和原则构成了学科话语传播的认知壁垒,而隐喻话语的核心价值恰恰在于通过经验具象化打通理论阐释的“最后一公里”。以“政治生态污染”为例,该表述将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的复杂性投射到权力运行场景,使公众直观理解不同层级、不同领域腐败行为的共生性与扩散性。腐败分子如同“污染源”,潜规则如同“污染物”,系统性腐败如同“生态链失衡”。这种认知转换使标本兼治的策略获得具象支撑,如同治理环境污染需源头截污与生态修复并举,反腐败同样需要“清除污染源”与“净化土壤”协同推进。

第二,深化对反腐败策略的认同。中国特色反腐败战略的认知建构依赖隐喻话语对复杂治理逻辑的认知适配。以“战争”隐喻为例,“攻坚战”“持久战”等概念将军事行动经验投射至反腐败领域,战争阶段的划分对应不同时期治理重点,如作风建设攻坚战持久战;作战体系构建则类比多部门协同,如纪委是“主力部队”、审计是“侦察兵”。这种经验移植使抽象的反腐败策略具象为可理解的作战指挥体系,使干部群众自然而然地接受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本质。

(二)价值传导功能

第一,传递核心价值。纪检监察隐喻话语的核心价值在于其能够精准、形象地传递党在反腐败斗争中所秉持的核心理念与价值导向。例如,“治病救人”这一隐喻,其核心价值在于传递了纪检监察工作并非单纯追求惩戒,而是蕴含着深刻的“惩前

毖后、治病救人”的教育挽救理念。它将违纪违法者比作“病人”,将纪检监察工作比作“治疗”,生动地阐释了党组织对犯错误同志的关怀、挽救与转化期望,强调了“严管就是厚爱”的价值取向,这就超越了简单的惩罚,体现了对人的教育的重视,传递了“惩处极少数、教育大多数”^[33]的宽严相济政策导向。这些隐喻通过将抽象的价值理念附着于人们熟悉的领域,实现了核心价值的具象化表达与情感化共鸣,成为引导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理解、认同纪检监察工作深层价值取向的重要话语桥梁。

第二,彰显政治立场。中国特色纪检监察隐喻话语的首要功能在于鲜明地彰显党的政治立场、性质宗旨,以及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坚定态度与治理理念。这并非空洞的表态,而是通过精心构建的隐喻体系,将党的政治意志与反腐败决心融入话语的深层结构与意象之中。例如,“打铁必须自身硬”这一隐喻,将党比作“打铁者”,将纪律建设喻为锻造过程,形象阐释党必须首先强化自身建设,才能领导好国家、治理好社会、服务好人民,体现了“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16]5}的要求。这一隐喻话语不仅揭示了“党的自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根本前提和保证”^[34],而且强调了“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保证”^[35]。再看“零容忍”这一表述,它如同无形的“高压线”,彰显党对腐败问题毫不妥协的坚定立场,向所有人传递明确信号,即“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36]139}。这些隐喻通过具象的意象选择,既体现了纪检监察工作的政治属性、根本目标与行动准则,也在话语层面持续强化和彰显党在反腐败斗争中的政治立场。

第三,彰显人民立场与为民情怀。纪检监察隐喻话语通过生动的意象,鲜明地彰显了纪检监察工作的人民立场与为民情怀,将维护群众利益、治理基层腐败的宗旨转化为可感可知、易于共情的表达。例如,将侵害群众利益的“微腐败”分子喻为“蛀虫”,这一意象具有强烈的贬义色彩与破坏性联想,不仅揭示了“‘微腐败’隐蔽性强,不易被发现且持续时间久”^[37]等特征,更直接指认其损害群众利益的性质,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基层腐败的坚决治理态度,从而“让群众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正风肃纪反腐就在身边”^[38]。再如“拍蝇”这一隐喻,与“打虎”“猎狐”共同构成新时代反腐败的战略

意象。“拍蝇”即“着力解决发生在基层和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29]5}，“拍”的动作凸显惩治的坚决果断，“蝇”则强调此类问题对群众利益的直接侵害与烦扰性,表明纪检监察工作既重“打虎”也不放过“拍蝇”,切实增强群众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获得感与信任感。总之,这些隐喻通过将腐败具象化为人民利益的侵害者,将纪检监察工作塑造为维护人民利益的正义行动,有力彰显了其“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与“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16]334}的为民情怀。

(三)情感动员与社会共识凝聚功能

第一,激发公众对腐败行为的痛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反对腐败。”^{[36]82}纪检监察隐喻话语通过“毒瘤”“蛀虫”等具象化表达,将腐败问题置于公众熟悉的健康与疾病这一认知框架中,有效激活了公众对腐败行为的痛恨与厌恶。这类隐喻利用公众对疾病的本能恐惧与排斥心理将腐败转化为可观、可感的生命威胁。例如,当我们反复提及“毒瘤”这一隐喻话语时,不仅强调权力腐败对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破坏,还暗示“毒瘤”的扩散性、隐蔽性以及治疗的紧迫性,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激发公众对权力腐败的厌恶与愤慨,进而促使公众对腐败行为的警觉与抵制。

第二,增强干部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与支持。纪检监察隐喻以“攻坚战”“持久战”等军事类隐喻为主要表达,将反腐败行动嵌入党自我革命的实践中。“攻坚战”“持久战”等术语不仅精准概括了反腐败工作的阶段性、长期性以及彻底性要求,还将腐败行为的复杂防治过程概括为干部群众易于理解的战略场景。这类隐喻将反腐败工作塑造为“战场”场景,实际上凸显了反腐败的紧迫性,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一刻也不能放松,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坚韧和执着,继续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39],以“行军”场景强调反腐败斗争的延续性。在对纪检监察干部教育中,使用“战场”“防线”等隐喻话语可以将监督执纪工作描述为职责使命的“实战演练”,激发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责任感、使命感与荣誉感;而“打胜仗”等表述则利用胜利“坚定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的信心恒心决心”^[40],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

展”^[16]²⁴的论断,既肯定既有反腐败斗争的成果又凝聚了党内外对未来反腐败斗争胜利的共同信念。

(四) 话语统合功能

第一,通过核心隐喻串联相关概念和子命题形成内部相对自洽的子系统。纪检监察工作涉及面广、内涵丰富,涵盖监督、执纪、问责、调查、处置等多个维度,包含大量抽象的概念以及复杂关系。隐喻话语通过确立若干核心隐喻范畴,为分散的概念和命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语义聚合点与逻辑主线。以“政治生态”为例,这一隐喻巧妙地将原本抽象的权力运行环境、干部作风面貌以及选人用人风气等诸多要素统摄于一个形象、直观的“生态系统”框架之下。在这个框架内,“污染源”指代腐败行为和不良风气,“净化”代表纪律审查和作风整治,“涵养”对应廉政教育和文化建设,“修复”则指向制度完善和监督强化,一些如“污染”“净化”“涵养”“修复”“风清气正”等子隐喻和具体表达皆是围绕“政治生态”这一核心隐喻范畴展开,共同构建起一个关于党内政治环境治理、内部逻辑清晰且相互支撑的语义子系统。由此,这种通过核心隐喻进行概念统合的方式增强了纪检监察话语体系的内在一致性、系统性以及整体性,使得复杂的理论阐释和政策要求能够在—一个相对自洽的认知框架中被公众和从业人员所理解和把握,有效避免了话语的碎片化和理解上的歧义。

第二,隐喻话语在联结党的政策话语与纪检监察学术话语时,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中国纪检监察话语体系一方面要准确传达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方针政策以及重大决策部署,另一方面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纪检监察学科理论体系。但是党的政策话语与学术话语在目标指向、受众群体以及表达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申言之,政策话语主要强调政治性、指导性以及号召性,而学术话语则追求学理性和逻辑性。隐喻话语在联结党的政策话语与纪检监察学术话语时,具有桥梁枢纽的功能,即它能够将高度凝练的方针政策、重大理念等转化为公众易于感知且易于传播的具体生活意向,同时又能为纪检监察学术研究提供富有启发性的概念框架和分析工具。例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作为一项明确的政策指导原则,通过“治病救人”这一核心隐喻获得了生动的具象表达。“病”喻指党员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医”代表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执纪工作,“救”则体现党组织关怀和挽救干部的初衷。这一隐喻不仅使政策精神更易于理解,也为纪

纪检监察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议题。“治病救人”成为理解纪检监察职能、目标与方法的关键理论抓手,相关研究可围绕该隐喻深入展开,涵盖问题线索发现与研判、执纪执法策略选择、监督效果反馈等具体方面,从而将党的政策精神深化、细化为纪检监察学术理论。

第三,隐喻话语还可以增强纪检监察话语的传播力与接受度。话语的效力不仅在于其内在逻辑的严谨性,更在于“话语传播的广度、深度和力度”^[41]。纪检监察隐喻话语通过其形象性、生动性、具象性表达可以提升纪检监察话语对内对外的传播效果与公众认同。先从纪检监察隐喻话语对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影响来看,隐喻话语降低了纪检监察领域内的专业概念和复杂理论的理解门槛,例如将“监督”这一概念比作“探照灯”“显微镜”,将腐败的危害形容为“毒瘤”,将反腐败斗争比作“攻坚战持久战”等。可以发现,这些源自日常生活的具体意象不仅能够唤起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切身体验,还能激发情感共鸣,使纪检监察领域内的专业概念术语以及抽象的政策理论、理念等变得生动易于理解。这样不仅有助于党员领导干部能够直观地理解党的纪律要求,清楚地认识违规违纪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以及真实感受“严管厚爱”的初衷,也有助于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理解党的纪检监察工作的现实意义与终极价值,进而大力支持反腐败斗争,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对外而言,在讲述中国反腐败故事、宣介中国治理经验时,恰当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隐喻话语,能够超越语言和文化的表层障碍,更有效地传递核心信息和文化内涵。尽管部分隐喻在直译时可能面临“文化折扣”,但其背后所蕴含的反腐败决心,却可通过生动的意象直观展现。例如,“打虎拍蝇”“刮骨疗毒”等表述,虽植根于中国语境,却以其强烈的行动意象,向国际社会清晰传达了中国反腐败的力度与广度。这种话语策略在国际共识构建中亦见成效。如“《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开创性地提出对外逃腐败人员和外流腐败资产‘零容忍’、国际反腐败追逃追赃体系和机制‘零漏洞’、各国开展反腐败追逃追赃合作时‘零障碍’的概念,这是继《北京反腐败宣言》之后,在多边框架下再一次以国际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加强国际反腐务实合作的‘中国主张’”^[42]。这表明,源自中国实践的“零容忍”等话语,不仅在国内形成强烈共识,更通过多边机制上升为国际共同理念。

三、纪检监察隐喻话语在学科话语体系中的优化适用

当前,在构建中国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的过程中,纪检监察隐喻话语的运用还面临着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纪检监察隐喻话语过度泛化与僵化可能导致概念模糊或简化复杂,例如在“制度笼子”隐喻中,学界的讨论倘若停留在“编织更密牢笼”的象征层面,而疏于探究权力清单的动态调整机制、监督技术的嵌入路径等实质性问题,可能会弱化学科解释复杂现实的穿透力。二是纪检监察隐喻话语与法言法语协调不足,与政策话语、学术话语的使用边界有待厘清,如“制度笼子”在政策动员中可以有效传递权力约束的理念,但作为法学概念时,“笼子”的边界可能无法涵盖程序正义、比例原则等现代法治元素,在某种程度上难以对接监察法中权责法定的规范表述。三是部分纪检监察隐喻话语在国际传播中可能产生理解偏差,如“打虎拍蝇”通过动物隐喻构建的反腐图景,在国际传播中既因文化符号差异弱化了“无禁区全覆盖”的反腐败治理实质,易被简化为选择性执法,更可能因“动物猎杀”的暴力暗示引发对法治程序的质疑,这种深层语义的消解不仅会阻碍学科知识的全球对话,更可能导致中国特色监督理论被误读为政治修辞而非学术建构。所以,为规范纪检监察隐喻话语的使用,助力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的构建,有必要探索其优化适用路径,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 夯实隐喻话语的理论基础与文化底蕴

第一,加强纪检监察学基础理论研究,为隐喻提供坚实概念基础。纪检监察隐喻话语的有效性与生命力,根植于纪检监察学深厚且自主的基础理论体系。加强这一基础理论的研究是确保隐喻话语在学科构建中发挥正面功能的首要前提。当前,纪检监察学作为新兴学科亟须构建起能够阐释其特有运行逻辑、价值原则、功能定位的核心概念群,如“政治生态”“四种形态”等核心范畴的精确内涵、相互关联及运作机理。只有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有深刻的、系统性的认识,形成清晰、稳定、自洽的概念基础,其衍生的隐喻话语才能具备内在的逻辑自洽性和阐释穿透力。例如,对“政治生态”这一概念的深入研究,需廓清其内涵与外延,明晰其构成要素、内在运行机制以及其“生态性”的本质特征。相反,若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对诸如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

层次划分标准和转化衔接机制缺乏精细界定,那么在教学中泛化使用“治病救人”的隐喻就可能失焦,无法清晰地指向“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与“严肃惩处极少数”之间的内在策略差异,反而可能模糊政策边界,削弱话语的指导性和学科的严谨性。因此,在纪检监察学科构建伊始,就应投入力量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如此一来,纪检监察隐喻话语方能真正成为构建自主话语体系的有力支撑。

第二,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拓展隐喻来源与解释力。纪检监察隐喻话语的创新与深化,亟须超越单一学科的视野,广泛、深入地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以汲取多元智慧,拓展隐喻来源的广度与深度,并增强其在学科话语体系中的解释力。纪检监察学本身即具有显著的交叉融合特性,其话语体系的构建,特别是隐喻的选择与运用,可以从法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多个领域的理论方法中获得丰沛滋养。法学的严密逻辑与权利义务结构为理解和构建“制度笼子”等隐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支撑与边界约束,确保其不脱离现代法治精神;政治学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深化对“刀把子”“生命线”等具有强烈政治意涵隐喻的理解,揭示其背后的权力逻辑与治理策略选择,强化其价值传导的精准性。传播学关于符号编码、受众认知与传播效果的理论,则为优化如“探照灯”“显微镜”这类强调监督效能的隐喻在大众传播中的情感动员效果提供了策略指导。因此,多学科交叉研究是纪检监察学科拓展话语资源库的必由之路,是将基础理论具象化、增强学科话语体系内在活力和适应性的必要环节。

第三,系统梳理与阐释中华传统优秀监察文化中的隐喻资源。中国特色纪检监察话语体系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其隐喻表达尤为鲜明地烙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基因。系统梳理与深入阐释这一宝贵资源并非文化寻根,而是夯实学科话语文化底蕴、凝练民族精神标识、增强话语时代穿透力的战略性工程。传统监察思想与实践沉淀了极为丰富的修辞智慧与隐喻表达,深刻反映了古人对权力监督本质、腐败成因危害及其治理方略的独特认知与价值取向,如“上医医国”情怀将国家治理比拟为疗愈病体,隐含了系统调理、标本兼治的理念,成为“刮骨疗毒”“治病救人”“猛药去疴”“治未病”等现代纪检监察隐喻话语的原型。对传统隐喻资源进行系统的概念史梳理、语义脉络爬梳与文化哲学层面的深度阐释,将会显著提升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的民族特色、文化根基与历史纵深感,使隐喻表达不

仅成为一种语言工具,更成为一种富含中华文明基因、凝聚身份认同、易于为党员干部和群众所内化理解的独特学科符号与标识,从而在更深层次服务于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二)提升隐喻话语使用精准度与适配性

第一,明确核心隐喻在学术研究、政策传播、教育教学等场景中的定义与使用边界。纪检监察隐喻话语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其使用的精准度与边界。在学术研究场景中,隐喻话语的核心目标是追求理论的精确性、逻辑的自洽性与知识的创新性。因此,隐喻在此场景下应严格定位为辅助认知工具,服务于对复杂概念或抽象机理的形象化理解,其使用需极为审慎,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学理分析基础之上,且不能替代或模糊严谨的学术术语和概念界定。例如,在研究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转化机制时,可以借助“治病救人”的隐喻来辅助说明“抓早抓小”与“惩前毖后”的层次性,但研究的核心必须聚焦于形态划分的客观标准、转化适用的具体条件、程序设计的规范性等实质内容,避免陷入对隐喻本身的过度解读而偏离学术探讨的主要方向。在政策传播场景中,隐喻话语的核心目标是提升政策内容的传播力、增强社会理解与认同、凝聚共识。在此场景下,适度使用形象生动、感染力强的隐喻是被允许且有益的,有助于将抽象的政策理念转化为公众易于感知的意象。然而,为避免隐喻可能引发的简化、歧义或误读,需配套权威、清晰的解读机制。例如,“治病救人”作为执纪重要原则,其隐喻内涵必须严格限定于特定的党内教育挽救程序与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框架内,清晰界定其与司法“惩罚”的边界,防止过度引申或滥用,确保其在传达组织关怀的同时,不弱化纪律的刚性约束力。在教育教学场景中,隐喻话语的核心目标是传授知识、培养思维、塑造价值观。隐喻在此场景扮演着重要的桥梁角色,帮助学习者尤其是初学者跨越抽象理论与具象认知之间的鸿沟。但教学中的隐喻运用需要超越简单的形象类比,深入挖掘其背后的科学内涵、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等深层内容。例如,在讲授监督的精准性时使用“显微镜”隐喻,不仅要说明其放大细节、深挖问题的直观含义,更要引导学生理解这映射了监督工作中线索深挖、证据固定、问题定性的必经程序和专业技术要求。

第二,强化教材编写中隐喻的科学内涵阐释。纪检监察学的教材体系是知识传承和人才培养的核心载体,其对隐喻话语的呈现方式直接影响学习者

对复杂理论的理解深度与精准度。在教材编写中引入或阐释隐喻,绝不能仅将其视为生动的修辞点缀,而应深刻挖掘其背后的科学内涵与认知功能。教材应清晰揭示所选隐喻是如何服务于核心概念的认知构建与价值传递。例如,在阐述“监督”职能时,常用“探照灯”“显微镜”等隐喻,教材需要深入阐释其映射到监督工作中的全方位覆盖、精准识别问题线索、深挖细查潜藏违纪违法问题等核心要求。教材应引导读者理解“探照灯”强调的是监督的广度和威慑力,“显微镜”则突出监督的深度和精细度。尤其对于蕴含着重大理论和政策意涵的隐喻诸如“政治生态”“标本兼治”等,教材必须结合中国特色纪检监察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具体实践案例,进行多层次、递进式的解析,要讲清楚“生态”是如何类比组织内的关系的,“本”与“标”在治理腐败中的辩证关系和具体策略指向,避免让隐喻成为模糊的象征,使学习者能够透过具象的语言,准确把握科学内涵和精准的实践要求,最终内化为专业素养和思维能力。

第三,注重与法言法语有机融合,确保学术表达严谨。纪检监察学作为兼具政治属性与实践属性的学科,其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妥善处理好隐喻话语与法言法语之间的关系。倘若过度依赖或缺乏约束地使用隐喻话语将会面临巨大风险,如可能导致某些概念语义模糊甚至在纪律审查、案件定性描述中造成法律依据的遮蔽或理解的随意性。因此,有必要促进隐喻话语与法言法语有机融合,这是提升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严谨性和权威性的题中之义。在学术研究与教材表述中,倘若引入隐喻,那么这些隐喻话语的落脚点应当是最终应服务于对党规国法、党纪等概念内涵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以及本质特征深刻、形象但又不失精准的阐释。例如,当我们在讨论“制度笼子”这一隐喻时,就必须明确这一隐喻所指的具体制度形态及其法理基础和运作机理等实质性内容。尤其在涉及具体的证据规则、程序规范、定性量纪的阐述中,应严格以法言法语为基准框架,隐喻的使用应是对其严谨表述的补充性说明或深化认知理解,而非替代或弱化其精确含义。要警惕对腐败分子的“虎、蝇、狐”等情感色彩过于浓厚的非正式比喻进入专业性文件、案件分析或制度设计的规范表述。学术话语还需建立“转译”机制,即在运用隐喻后,进行适度的法言法语“还原”或解释,确保核心概念在形象化表达之后,依然能清晰地锚定在法律规范体系之中,避免认知偏差和话语冲突。这要求在理论构建和文本表达过程中,形成一

套自觉的、规则清晰的隐喻筛选、阐释与融合机制。

(三) 增强隐喻话语认同与影响力

第一,提升纪检监察干部运用、阐释隐喻话语的能力。纪检监察干部是纪检监察隐喻话语的主要践行者与传播枢纽,其运用与阐释能力直接关系到话语内化深度与现实效力。提升其能力需系统强化理论涵养与实践转化,需在专业培训中深化纪检监察干部对中国特色纪检监察话语体系的学习,明晰如“刮骨疗毒”承载着党以断腕勇气维护肌体纯洁性的政治决心,使其理解隐喻是揭示反腐败斗争本质规律的认知工具。实践中重点培养纪检监察干部面对复杂案件与多元场景时尤其是在案件通报中精准选用、灵活转化隐喻的能力。此外,还要培养纪检监察干部对隐喻双重性的辨识力,避免“毒瘤”等隐喻的过度使用引发对问题的误判,通过定期开展案例复盘、隐喻应用研讨、编制情景化教学材料等方式,将隐喻转化为可操作的沟通“工具箱”,使纪检监察干部成为兼具学术理解力与实践传播力的关键主体。第二,加强面向社会公众的阐释与传播。推动纪检监察隐喻话语实现社会化理解与价值内化,需要构建多元化传播渠道,借助权威媒体系统阐释诸如“探照灯”所承载的监督无死角理念、“防火墙”体现的预防为先策略,明确其制度内涵而非象征本身,避免浅表化传播;支持高质量自媒体解读,以公众熟悉的生活隐喻搭建理解桥梁。第三,建设核心隐喻的国际“转译”机制。推动中国特色纪检监察话语的全球认知,需建构兼顾文化差异性与理论严谨性的跨语境表达体系。为此,需基于传播目标分级设定策略,面向发展中国家侧重“治理共性”转译,如将“制度笼子”解析为“系统性权力约束机制”;面向国际学界则构建学术型转译网络,如将“标本兼治”转化为“多层次腐败干预模型”,依托学术会议与智库对话推动理论认同。此外,还需善用“外嘴外脑”,以国际学者、记者的第三方视角对中国纪检监察实践与话语进行“在地化”解读,从而降低“文化折扣”。

结 语

纪检监察隐喻话语绝非简单的修辞点缀,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推进自我革命、深化反腐败斗争实践中生成的政治认知工具与话语创新成果。作为根植于中国独特政治土壤、深厚文化传统与鲜活治理实践的语言现象,其生成逻辑深刻体现

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43]的思想精髓,回应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需求。推动纪检监察隐喻话语的科学建构与规范运用,其核心指归在于锻造一套既深植中国土壤、彰显党的执政规律与管党治党智慧,又兼具世界视野、能够参与全球反腐败治理话语对话的特色纪检监察学的自主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的成熟与完善,对内将夯实理论认同、凝聚实践共识、引领专业人才培养,对外将有力宣介中国反腐败治理的独特逻辑与显著效能,为丰富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因此,只有在坚守学科政治属性、学术严谨性与文化主体性的辩证统一中持续深化话语创新,纪检监察学才能真正成为一门立足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指引中国道路的成熟自立之学。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N].人民日报,2025-10-29(1).
- [2] 刘先锐.论思想政治教育隐喻的构思过程与达意机制[J].思想理论教育,2024(5):56-61.
- [3] 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3.
- [4] 张爱军,秦小琪.网络政治隐喻的功能研究[J].学术界,2018(3):73-84.
- [5] 陈勇,刘肇云.隐喻政治与政治隐喻:论美国政治家的政治隐喻[J].外语教学,2009(1):25-29.
- [6] 彭华新.“农民工讨薪”新闻中的敏感议题及脱敏研究[J].当代传播,2015(2):91-93.
- [7] 杨明星,赵玉倩.“政治等效+”框架下中国特色外交隐喻翻译策略研究[J].中国翻译,2020(1):151-159.
- [8] 王丽惠.集体成员权的政治隐喻及对配置规则的影响[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6):110-121.
- [9] 刘练军.纪检监察学“三大体系”论纲[J].中国法学,2024(1):186-205.
- [10] 卜万红.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的百年构建:历史演进与原创贡献[J].河南社会科学,2024(4):42-50.
- [11] 李莉.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维度[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58-73.
- [12] 杜治洲.构建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12):112-119.
- [13] 张旭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内在逻辑与创新发展[J].人民论坛,2020(21):88-91.
- [14] 吴宗伟,薛念文.中国共产党“政治体检”的百年探索历程、基本经验与完善路径[J].求实,2021(1):4-15.
- [15] 任建明.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逻辑与对策[J].理论探索,2015(6):43-47.

- [1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17]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9.
- [18]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6.
- [19] 安钰峰.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1):1-14.
- [20] 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58.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41.
- [22] 解丽霞,梁曙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逻辑、实践与经验[J].广东社会科学,2020(3):14-22.
- [23] 房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三重解读[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2):91-99.
- [24]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4.
- [25] 邓纯东.坚持百年来党的自我革命基本路径[J].理论视野,2024(6):76-81.
- [26]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9.
-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37.
- [28]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9]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月12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30] 秦书生.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研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6):87-98.
- [31] 王诗雨.坚定不移深化反腐败斗争[J].中国纪检监察,2021(3):52-53.
- [32] 浦兴祖.反腐败本:硬法制与软文化相济[J].探索与争鸣,2014(11):17-19.
- [33] 韩云霄.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生成逻辑、理论创新与实践进路[J].学习与探索,2025(4):48-54.
- [34] 刘靖北.论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战略思想[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11-19.
- [35] 饶武元,肖舒丹.中国共产党大党形象话语体系建构的逻辑理路、内容聚焦与叙事策略[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3):23-33.
- [3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37] 田雪梅,张旭.巡察治理“微腐败”的价值、困境及策略[J].中州学刊,2020(10):13-19.
- [38] 闫书华.习近平关于作风建设重要论述的时代品格和践行路径[J].理论探讨,2021(2):13-18.
- [39] 习近平.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J].求是,2022(13):4-19.
- [40] 冯志礼.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J].红旗文稿,2025(3):4-8.
- [41] 骆郁廷,余焰琳.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的构建维度[J].教学与研究,2025(7):5-15.
- [42] 王卓.联合国大会首次举行反腐败问题特别会议 中国理念主张凝聚广泛共识 推进国际反腐败事业迈上新征程[EB/OL].(2021-06-07)[2025-08-10].https://www.ccdi.gov.cn/toutiaon/202106/t20210607_146454.html.
- [4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236.

Metaphorical Discourse in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Studies in China: Generative Logic, 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Normative Application

Wang Lifeng Xia Qingming

Abstract: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Metaphorical Discourse is a linguistic symbol rooted in the governance wisdom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egrated with the essence of Marxism localized and modernized in China, and serving the practice of comprehensive and rigorous Party self-governance. It boasts distinct political orientation, practical attributes,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figurative images such as “institutional cage”, “political ecology” and “political physical examination”, it transforms abstract concepts like Party discipline and power supervision into perceptible cognitive frameworks, realizing the concrete interpretation of core concepts, the revelation of the inherent hazards of corruption, and public recognition of governance strategies, while embodying value concepts such as “treating the sick to save people” and “scraping bones to heal toxins”. In 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studies, metaphorical discourse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by empowering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creating localized discourse symbols, enhancing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expanding academic topics. However, it also faces challenges including conceptual generalization, devia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inadequate coordination with legal language.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olidat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metaphorical discourse, improve its accuracy and adaptability in use, and strengthen its recognition and influence, thereby ultimately ser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studies.

Key words: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studies; discourse system;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etaphorical discourse

责任编辑: 弈 寒